

柘
城
县
志

人物編

征求意见稿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日

柘城县志征求意见稿

编辑、出版：柘城县志编委会总编室

封面设计：王敏扬

印刷：柘城县印刷厂

出版时间：一九八六年

（内部刑物 注意保存）

目 录

- 一、革命烈士
- 二、革命干部
- 三、知名人士
- 四、其他人物
- 五、革命烈士英名录
- 六、省以上劳动模范一览表
- 七、在外地科技人员一览表
- 八、中级知识分子基本情况登记表

(一) 郑廷珍

郑廷珍，河南省柘城县牛城乡郑楼村人，生于一八九三年农历正月十七日。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在抗击日寇侵略的忻口战役中壮烈殉国，终年四十四岁。

郑廷珍的祖父是当地著名中医，医术高超，且治病不拘贫富，深为乡邻敬仰。郑廷珍的祖父死后，医道失传，家道中落，再加上连年的军阀混战，灾害频仍，到他成年之时，已是室如悬磬。所以，他只是粗识几字。在拮据生活之中，他饱尝到了谋生的艰辛，有了与劳苦大众接触的机会。因而十分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和悲惨遭遇。

一九一七年，冯玉祥到河南招兵，郑补入冯玉祥部第十六混成旅李鸣钟第三团当兵。从此随冯玉祥将军转战南北。他先后参加了冯玉祥反对吴佩孚、改组北京政府、驱逐废帝溥仪及清皇室出宫的北京革命等重大事件，颇受冯将军治军思想影响。以其刚毅、勇敢、正直、勤奋、廉洁和记忆力过人，受冯玉祥器重，从普通兵层层晋升，历任排、连、营、团、副师长和独立第五旅旅长等职。

三十年代正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政治舞台，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空前高涨的年代。由此，长期的戎马生涯不仅形成了他那军人特有的勇往直前的气质，而且形成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极

为不满，对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深表同情。因此，“爱兵如子，爱民如父”便成了他治军的座右铭。对将士的冷暖、疾苦时刻挂在心上。士兵可以和他平起平坐，说笑话，拉家常，可以和他在运动场上争抢兰球、摔跤比武，甚至嬉戏掏腰包。官兵有特殊困难，被他发现或向他提出，他总是慷慨解囊，他凭自己过人的记忆力，能叫出全旅大多数将士的名字。一些老兵的籍贯和家庭情况都能一一说出。因此将士对他无比敬仰、信赖，乐于听他指挥。但是，他军纪严正、赏罚分明，从不偏袒。对劳苦百姓决不允许欺压，不管是士兵还是军官，只要犯了欺压老百姓的罪行，决不姑息养奸，均交军法议处。部队每次移防都要检查纪律，必须百姓不少东西，方能行军。行军所到之处，农忙时动员全旅将士为老百姓收割庄稼；平时组织医务人员为老百姓治疗疾病；开展以群众纪律为主要内容的评比会，奖优罚劣。郑廷珍部徐营长和申连长，就是死于违犯群众纪律的。同样，对于地方上的地痞流氓，也是严惩不贷。一九三三年，郑廷珍旅驻防霍丘，顺从民意，处死了凶残的恶霸李继航和陈孝毅。霍丘人民拍手称颂。一九三五年郑部换防时，霍丘人民夹道挽留。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怒潮，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不是顺从民意抵御外寇，而是积极对中央红军革命根据地实行“围剿”。梁冠英遵从蒋介石的旨意，督促郑部进剿。面对此情，郑廷珍愤然道：“国难当头，不思抵御外寇，反倒同室操

戈，我这个旅长干脆不干了。”参谋长高曾基（陕西定边人）非常理解郑廷珍旅长的爱国心，劝他以大局为重不要放弃枪杆子。郑廷珍顺从劝导留下以后，和高曾基多次设巧计，从侧面帮助红军，并与红军私定了互不进犯的君子协定。有一次，郑廷珍得知红军的小队人马被困在六安西边的一座小山，弹尽粮绝，无法转移。他马上派参谋长高曾基率领一连人，带足枪支、子弹和食物，以进攻为掩护，在傍晚丢弃大量军需物资，撤退下来。

请缨御寇，奔赴沙场。一九三〇年的中原大战，冯为蒋所败，冯玉祥的部队分崩离析，梁冠英部为蒋介石收编。郑廷珍旅属梁冠英的第二十五路军三十二师建制，任三十二师副师长兼第五旅旅长。后因对梁冠英大量克扣军饷不满，终于和梁决裂，并受三十二师各旅团长委托，愤然出面反梁，向南京告发，导致该旅独立，直属军委会，由卫立煌将军管辖。“七七”事变发生后，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热潮，这使郑旅长激动不已。他对参谋长说：“曾基，作为一个军人，眼看国土被敌宰割，我十分痛心。大丈夫当战死沙场，吃了称砣铁了心，我坚决北上杀敌”。高曾基十分赞成，当即就电请南京军部，要求出征杀敌。但未获准。于是，他们又亲自到南京代表独立第五旅全体官兵请愿。迨获准后，星夜驰往驻地，命令所属613、614、615三个团到合肥集合。然后简单地把家属安置一下，就率领部队出征了。（只有613因被梁冠英扣留，没有参战）。行军路过河南老家，电

告家人在柳河车站相聚，见面时，郑廷珍向年迈的母亲深深地磕了一个头，表示了打不败日寇决不生还的决心。他在给将士讲话时说：“过去自己人打自己人，死了不值得，现在为打日寇去作战，拼光拼净也甘心情愿，打不败日本鬼子一个都别回来”。铮铮誓言，表现了他民族危亡之秋，那种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青山绿水流碧血，千古华夏颂英雄。忻口战役是抗日战争初期在晋北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一次大规模战役。晋北之战，事关华北抗战之胜败；守忻口就是挽救山西危亡；保卫山西就是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国共两党、两军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意。坚持了华北抗战。前战总指挥卫立煌将军，于十月十二日把所部部队展开于忻口东西两侧，十三日激战开始。郑廷珍率独立第五旅赶到抗战前线时，正值日军突破我防线，第九军五十四师阵地突击部南怀化高地失守，卫立煌将军号召全体将士誓死夺回阵地，挽救危局。郑廷珍旅长首当其冲，经同意后，独立第五旅会同二十一师，五十四师等兄弟部队在忻口西北、南怀化东北高地上构筑工事。十月十五日夜，争夺南怀化高地的战斗打响了。二十一师和独立第五旅的将士奋勇当先，浴血奋战，前仆后继，接连攻下六座山头。到十六日拂晓，郑部已推进到日军前沿阵地。但是，日军却凭着有利的阵地和精良的武器负隅顽抗。我军数次猛攻均未奏效，且死伤惨重。但是，要是天亮前攻不下南怀化高地，郑部就全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就有全军

覆没的危险。因此，郑廷珍旅长心急如焚，愤怒的眼睛里喷着火，决心与敌人拼个鱼死网破，来为后续部队开辟通路。他不顾部下劝阻，毅然跳出掩体，亲率部下攻山。敌人的机枪吐着火舌，弹如飞蝗，铺天盖地倾泻过来。郑旅长终于饮弹倒地，以身殉国了。

郑廷珍旅长为抗战殉国后，遗体在太原入殓，然后转道运往河南，沿途群众无不为之沉痛哀悼。遗体运到柘城，豫东各县及临近诸省都派有代表参加送葬，当地政府也为之举行了隆重安葬仪式。安徽省合肥市各界为郑廷珍旅长举行了追悼大会。国民政府明令褒奖，追赠为陆军中将。中国共产党在巴黎的《救国时报》称之为：为了民族解放，贡献了最后一滴血，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战死疆场，为国殉难，是革命军人的无上光荣。他的英名将与我们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民族英雄、革命战士的英名同垂不朽，流芳千古。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前夕，一九八三年六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又追认郑廷珍为革命烈士，颁发了烈士证书。同时，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和山西省政协编辑出版的《忻口战役亲历记》两本书，都记载了郑廷珍旅长的革命业绩。

(二) 李平

李平，原名李运妍，河南省开封市人。一九二八年出生于开封市一个贫苦邮电职员的家庭。父亲李鸿词是邮电工人，受过共产党的思想教育，痛恨不平等的旧制度，追求进步，反抗压迫，参加过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解放后担任过开封市邮电系统执委常委。

李平自幼读书，性格开朗，思维敏捷，善于分析问题，在他父亲的影响下，憎恨剥削和压迫，思想倾向革命。她在开封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经常与杨静彰、陈秀峰等革命者来往，听他们讲革命道理，进步很快。一九四五年开封女师学生不堪忍受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欺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李平是这次运动的骨干力量。学生运动后，李平被开除学籍，一九四六年，李平通过陈秀峰介绍，认识了搞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王飞霄同志。王飞霄同志给李平详细介绍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斗争生活，讲述了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的道理，李平深受启发和鼓舞，找到了自己理想的精神支柱——共产党，于是决心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

一九四七年一月，李平与王飞霄同志在开封结婚后来到柘城。不久，李平被任命为豫皖苏军区第一分区宁柘商支队文书。当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李平到支队不满一年就参加了二十多次战斗，每次都主动承担最艰苦的战斗任务，并表现得英勇顽强。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深夜，宁柘商支队在柘城县西北代口寨召开工委会议时，被国

民党新五军二八六团唐运奇营及一伙匪徒包围。在这次突围中，李平壮烈牺牲，时年仅十九岁。

宋玉樵

男，汉族，1919年生，系柘城县慈圣乡宋屯村人，柘城师范毕业。1936年在柘城一小任教，他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日寇的疯狂侵略，人民生活的痛苦，心中充满了忧虑和愤恨，立志寻找中国救亡图存的光明道路。

1938年阴历5月初，投身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在晋东南抗大学习，后分到三八六旅工作。1946年军队扩编为冀鲁豫四纵队十旅，后调到该旅二十九团任参谋长。1947年2月吕梁边区汾孝战役后，任副团长兼参谋长。

1947年4月，四纵队组织晋南战役。在战斗前夕，他带领侦察班和警卫员黄振华等十余个同志，到前沿阵地观察地形，行到山西省侯马市附近的万户村，被敌人发觉。敌人出动大批的部队包围，突围中他受了伤。这时，他命令同志们撤退，自己利用一个坟堆掩护。警卫员黄振华执意不走，继续留在他身边阻击敌人。同志们顺利地突围，他和警卫员边打边退，最后在一座破窑里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终因弹尽，警卫员牺牲，他惨遭敌人的杀害，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

罗云礼

男，汉族，1960年生，系柘城县梁庄乡罗庄人，贫农出身，高中毕业，1979年参军，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九十三团特务连付班长。1981年在保卫祖国南疆的战斗中光荣牺牲，年仅二十一岁。

1981年7月，罗云礼同志随侦察分队到中越边境值勤，先后为战友们排雷十二颗，开辟道路五条。10月15日，在捕获入侵者的战斗中，为战友们开辟道路，在即将到达敌阵地顶峰的危险时刻，他主动替换下本班战士王建民同志，排除了六颗地雷，就在排第六颗地雷时，触响了另外一颗地雷，为保卫祖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根据罗云礼同志生前要求，中共陆军第三十一师委员会追认他为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给他记一等功，并颁发了奖章，奖章证书和立功受奖证书。

二、革命干部

张非垢

乳名振周，学名福垢，字载五，号庸人，参加革命后改为非垢。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旧历十一月十五日）生于柘城县牛城乡郭村岗一个日趋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四十岁。

张非垢的父亲张协焯，字直夫，是重视封建家教和封建道德修养的典型旧式读书人。张协焯，待人宽厚，一生简朴，家道兴隆时曾积极在乡里办私塾，因而在乡里颇有声望。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目睹日寇在柘城烧杀抢掠的暴行，激起了民族义愤，赞成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积极支持儿子参加八路军。张非垢兄弟五人，排行二。

张非垢，少时异常聪明，颇具天资，深受家庭父兄和私塾老师的钟爱。这样，他六岁入柘城完小读书，十二岁入淮阳省立第三中学读书，十五岁入省会开封河南大学附属高中读书。高中就读期间酷爱文学，一面仿古体诗，一面开始研读郭沫若的小说和诗歌。“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抗日反帝爱国运动，运动的浪潮波及省城开封。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积极参加了学生请愿，示威游行，抵制日货和为东北义勇军募捐的活动。运动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后，他对国民党投降卖国的倒行逆施开始有所认识。但是，对于中国怎样摆脱黑暗，走向光明，出路在哪儿？尚且渺茫。

中国的希望之光在陕北，在延安，一九三四年秋，十七岁的张非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新闻系为他瞭望世界，打开了理想之窗。这时，燕京大学的领导同志，通过观察和考验，介绍他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在党组织的关怀教育下，他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积极参加“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并在斗争中成为运动的骨干力量。他不仅承担了主编和发行“民先”全国总队部刊物《生活十月》与燕京大学“民先”油印刊物《先锋队》的工作，而且阅读了党的纲领性文献，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和埃得加·斯诺的《西北印象记》以及《巴黎救国时报》、《大众生活》等进步刊物。这些都促进了他的世界观的转变和升华，使他了解了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认识到人生的真谛。一九三七年四月，他抱着拯救于水火的美好愿望，毅然离开北平奔向延安。在延安，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接见，这更鼓舞了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崛起而奋斗的凌云壮志。同年五月返回北平，张非垢由燕京大学党组织负责人赵紫声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甘洒一腔血，励志报民族。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时，张非垢因回家探亲尚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他积极把家乡的进步青年王飞霄、宋玉樵、张权威等同志团结起来，组织了励志读书会。所谓“励志”就是励为民族解放流血奋斗

之志，读书会的主要内容是宣传抗日，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介绍延安、红军，并组织他们阅读《中国共产党宣言》、《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怎样动员千百万农民》等进步书籍和刊物。这对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柘城县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培训了骨干力量。一九三八年八月，张非拈去延安入鲁艺学习，结业后，他被分配到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编辑委员会，担任主编《战斗报》的编辑，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宣传工作生涯，一直坚持了十年，这十年间，他经历了一九三九年春季到秋季的冀中平原游击战争，冬季的晋察冀边区“反扫荡”的抗日战争的最严酷的时期，以及以后在晋绥边区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整个时期。在此期间，他置安危于度外，总是冒着枪林弹雨、深入战地采访，把每次重大战役的战绩和战斗英雄的光辉事迹及时报道出去，为广大指战员鼓舞士气。为此，他深受贺龙师长^{的赏识}及广大指战员的爱戴，屡屡晋升，先后担任过编辑科长、研究室秘书、军事通讯科长、晋西北军区政治部、晋绥军区政治部、西北军区政治部宣传科长、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一九五〇年，他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秘书长、副部长并兼管文教处工作期间，认真钻研了原来比较生疏的川剧，对当时川剧改革起了相当大的指导作用。

张非拈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忘我奋斗精神，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发展我国的体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一九五四年底，他被调往国家体委，先任秘书长，后任副主任。体育对他来说是很陌生的，但他

不畏艰难困苦，从头学起，认真钻研，反复探索，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就熟悉和掌握了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业务发展概况及其体育科学理论知识。他先后发表了三十多篇指导性的重要理论文章。这些文章，从运动竞赛、群众体育、体育教学和武术训练工作等方面进行了科学的著述。文章不仅热情洋溢地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体育工作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的形势和壮阔前景，而且针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不正之风，体育学院的学风，勤工俭学中出现的取消体育的错误，都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了发生错误的根源和解决的途径。

一九五六年秋，他率中国足球队访问苏联、南斯拉夫回来后，接连在《新体育》和《体育报》（试版）上发表了四篇文章指出，“我国足球运动水平与欧洲一流队有差距，输球是自然的，但运动员缺乏勇敢顽强的精神，该抢的不抢，该射的不射。对运动员要求不严，夸奖、迁就太多，日渐养成一种娇气。这样既违背了体育运动的宗旨，也妨碍了运动员的成长，有些教练员最有兴趣的是技术，但忽视基本技术而谈战术和技术，很易流于空谈，宣传上“胜了就大张旗鼓，败了就默不作声”这并不是—种健康的现象，表现了一和虚夸的风气，对犯错误的同志，他总是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他说：体育工作必须有过硬的技术和顽强的意志，只有这样才能在体育竞赛场上稳操胜券，没有意志和技术，就如同“没有墨水的钢笔，本来没水，哪能写得出字来”。使犯错误的同志心悦诚服。